

女性主义文论: 后学语境及其主体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前沿进展

张向荣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学”思潮的狂飙突进,消解了传统意义上启蒙哲学的时间和历史话语观,在无中心、平面化的背景下女性主义文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力量使女性主义从传统对抗发展到现代重构,从单向度批判到多元化思考,形成了当代新型的女性主义文论思维。这种新型思维强调对女作家和作品重新评价、对建构新时代女性主义文论重新探索,为“后学”语境下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提供了大量流动、变幻、融合甚至是矛盾的个案。其性别诗学、女性与消费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第三世界女性问题的关怀等主体意识都逐渐成为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文论 “后学”语境 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 张向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论在当今文史哲等人文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成为当代“显学”。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论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40—50年代,此时的文论聚焦于对抗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第二个阶段是60—70年代的女性研究者进一步讨论女性文学的文本及性别政治的影响等问题,

从纷芜繁冗的政治话题转型到关注女性写作的物质条件;第三阶段则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后学”语境思潮影响下的女性主义文论多元化发展格局。

^{*} 本文系教育部2011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波伏娃与张爱玲之比较研究——基于女性观的视角”[项目编号:11YJC752039]的阶段性成果。

前两个阶段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依据批评方法和理论基础而被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英美派侧重社会文化和历史研究,注重社会批判;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则基于哲学、心理分析学和语言学通过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语言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角度阐释“女性语言”和“女性写作”。^①

然而,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后学”(Post-ality)思潮的狂飙突进,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启蒙主义的时间和历史话语观,使女性主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为领军的“后学”解构力量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文论,使女性主义从传统对抗发展到现代重构,从单向度批判到多元化思考,形成了新型的女性主义文论思维:倡导个人化欲望、培植女性话语构建性别诗学以及对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女性问题的关注等。此时的女性主体意识虽然继续了“后学”之颠覆特征,但在一系列激进行动和亢奋态势后,更强调构建与男性主体和谐共建的主体间性关系。可以这样说,作为文学批评的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纠缠裹挟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思潮中的。

一、批判消费主义走出边缘

当代女性主义文论对倡导女性个人化欲望的实践进行了颇有见地的阐述。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人化欲望的实现首要的就是女性与商业文明的瓜葛,商业主体是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在消费主义已经成为社会意识构建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人们根据消费主体的差异而给予性别不同的定义:男性被视为生产者,是积极因素,女性被视为消费者,是消极因素。

女性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作为消费主体的家庭,家庭主妇就成为消费场所的常客,因此,家庭消费是女性消费行为的重要组成。女人通过挑选与购买家庭用品,积极

参与到社会消费领域,通过占据消费领域实现构建一个有别于生产者的场域。丽欧拉·兰德尔的《19世纪法国消费者活动的社会性别表现》和乔安·霍洛斯的《消费与物质文化》分别以法国、英国商业文明的发展历史为背景,叙述在此发展过程中消费、物质与性别、阶级等的关系阐述了女性的消费历史以及现代女性消费的语境。^②其共识在于:历史上看,经济对男性和女性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家庭生活的依赖导致女性文化被男性文化从社会主体中分离出去,家庭成为女性审美历史的重要场所;另外,商品的极大丰盛和集散促成了公共活动领域——百货商场的诞生,百货商店既是“城市自我意识”的代表,更是女性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意识”的公共空间。兰德尔和霍洛斯同时提出,消费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志,在承担了“喂饱全家”和“让全家生活在舒适氛围中”的责任下,消费行为帮助女性部分实现了家庭内部的“隐形权力”。早在70年代末,学者玛丽·道格拉斯和拜伦·伊史武德就认为,消费文化是“超越商业”的,很多人买东西、用东西或交换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有社会生活。^③随后,美国女学者爱瑞卡·拉帕泼特在《购物的快乐:伦敦威斯特恩特商场对女性的营销》中指出,百货商场给了那些做家务的妇女一个到外边透透气的机会,逛商场实现了“妇女的快乐”^④。英国女学者米甘·莫瑞斯在仔细考察了女性与购物中心的相互作用后,强调购物中心与女性的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女性消费欲望的膨胀,莫瑞斯为此造出了“商场语言”

① [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② [美]兰德尔《19世纪法国消费者活动的社会性别表现》,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36页。[美]乔安·霍洛斯:《消费与物质文化》,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137—152页。

③ Ma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p. 15.

④ Erika Rappaort, *Shopping for Pleasure: Women in the Making of London's West E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2.

(Plaza language) 一词。“商场语言”是以购物为主体的商家诱导宣传、心理攻势以及消费女性如何揣摩商场的意图等特定的商场语境。她在《与购物中心有关的要做的事情》一文中证明,消费过程其实是狩猎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一旦进入“商场语境”就犹如进入了“霓虹陷阱”,女性越来越受到欲望的驱使,暂时失去辨别力,进而会派生出理性之外的消费行为。^①

其二,从商业角度看,女性在消费行为中也被消费着。当女性通过消费行为获得购买欲望的满足后,其被化妆品、时尚服饰、家居形象装扮出来的身体成为商业符号,在不经意中充当起商品代言和宣传的角色,成为“被看”的角色。消费行为所购买的生活用品虽然使女性引起瞩目和好感,但却使女性在此过程中被物化为商品流动、交换和集散的工具,而操纵工具的则是创造商品的男性文化。女性在商业文明之下,在消费主体的“他者”身份中,已经实实在在地化身为商业符号,被“软禁”在喧哗的消费语境中。其社会现象类似被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称为“肯定的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的文化批判。女人们在“肯定文化”这座金丝笼中失去了个性特征,已经被商品驯化为无意识的“消费品”。温迪·布朗在文章《超越性别》中指出,资本的消费话语把男女差异商品化,并且在话语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窒息了任何企图取代男性主体地位的话语实践。^②

在商业消费中,女性对自身的利用也是女性被消费的一种抽象形式。男女约会、求爱甚至性行为中,女性可能利用姣好容貌为自己带来诸多社交优势。更何况在商业化包装时代,由于个性化欲望的膨胀,女性甚至将自己的优势——身体、美貌——出卖给消费主义。商家抓住了女性的身体优势和广告的“镜像”效应,利用女性的美貌和性感推销商品,尤其是推销那些女性化特征明显的商品如化妆品、时装、首饰、佩饰等时,会对俏丽的女模特进行“商业包装”,把她们变身为消费市场的“镜子”,一边表达“看我,看我”的宣

传语境,一边充当消费者的“镜像的身体”^③。凯西·佩斯在《化妆,翻新:化妆品、消费文化、妇女的身份特征》中指出,化妆品美化女性,既能传播个人吸引力和魅力、美化他人视阈中的女性形象,也让女人们在模特“镜像身体”的诱导下产生购买的冲动。^④玛丽·奥德姆的《20世纪初洛杉矶的单身母亲、失足少女和少年法庭》指出女人都希望通过化妆品的塑造把自己变成某个浪漫的女主角,营造模仿出来的虚幻满足感。^⑤乔安·霍洛斯还原了第二次女性运动浪潮中“时装”被当做女性束缚的事实,然而,女权运动最终没能抵挡得住商业对女性的诱惑,女性时装在商业化浪潮中又恢复了高度夸张的女性特征——高跟鞋、塑形内衣、性感的礼服都成为显现女性特征的重要服装元素。^⑥商家将美女与美食、美景、香车、美物等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放在一起作为营销手段,实际上是消费主义对女性的策反和驯服,是商业对女性的双向利用,既诱导女性消费,又消费女性的容貌满足大众的视觉审美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迈拉·麦克唐纳指出“这些不是实际上具有自制力的女人的形象,而是根据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制造出女性的种种责任,然后编织到女人身上。”^⑦当现代社会的女性企图走出被边缘化的境遇,希望营造满足个人化欲望的语境

① Meaghan Morris, “Things to Do with Shopping Centers”, in John Hartley eds.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p. 295 - 319.

② Wendy Brown, “Beyond Sex and Gender”, University of Iowa, vol. 11(2002), p. 6.

③ 蓝佩嘉《销售女体,女体劳动——百货专柜化妆品女售货员的身体劳动》,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166页。

④ [美]凯西·佩斯《化妆,翻新:化妆品、消费文化、妇女的身份特征》,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178—198页。

⑤ Mary Odem and Single Mothers, “Delinquent Daughters and the Juvenile Court in Early - Twentieth - Century Los Angele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5, vol. 9(1991).

⑥ [美]霍洛斯《时装与美容实践》,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201—202页。

⑦ 转引自[美]妮勃洛克《广告业》,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219页。

时,却使女性陷入另一个吊诡的境地——女性通过消费实现权力,却被所谓的“权力”束缚在“自我消耗”的欲望化困境中。

二、培植女性话语构建文论的性别气质

由于生理机制本身的差异,即使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男人与女人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在正常情况下也无法共通。因此,当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平等论”陷入妄自超越的时候,已经有女学者开始从自身和理性角度进行了自我检讨。凯特·米勒在《性政治》中认为,女性要求“平等”其实只是一场精神错乱的集体狂欢,如果女性连母性都要抛弃,那将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事物”^①。波伏瓦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若非错误信仰,没有妇女能够要求超越她的性别”^②。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就此前的女权困惑指出“女权主义已经演变成一种偏执的教条,无谓地浪费了女性的宝贵潜力。”^③女学者们摒弃了女权主义者的臆想、一味指责和对抗姿态,逐渐意识到在性别社会中提倡“性别气质”无疑对转变女性话语的边缘性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重任落到了强化女性文学的女性气质研究方面。

当平等论将女性沦入歧途、消费主义将女性拖入异化境地时,西方女性主义普遍表现出自我寻觅和自我确证的决心和勇气,试图从“超越”和“欲望满足”的论述中摆脱出来,游离性别对抗情绪,重构女性在性别社会中的价值体系。女学者们十分重视采用文学文化的视角和解构主义的手段推进一度陷于平等论的女性主义,强调探讨女性生理、意识的独特性,例如“性”、“性别”、“性别理论”。此时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表现出多视角多元化的阐释方式。美国的女学者帕特里夏·斯帕克斯被认为是第一个注意到游离于男性中心文化之外的独特的女性话语的学术批评家,她的《女子的想象》拉开了女性文学批评新阶段的序幕。1985年,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玛

丽·朴维的著作《规矩淑女与妇女作家》,让对女性文学的性别气质的研究进入女性主义文论视野。同一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芙琳·凯勒出版《反思性别与科学》,她分析了性别意识形态在社会交往和科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1992年,她出版著作《生的秘密,死的秘密:论语言、性别与科学》,阐释了女性在语言、生存状态、意识感觉方面与男性的巨大差异。伊莱恩·肖瓦尔特主编的《新女性主义批评》梳理了现代女性主义文论的发展史;安妮·普拉特的《妇女小说中的原型模式》以一种“比较性别”的观点打开了重新认识女性文学的批判思路;罗瑟琳·科渥德的《女性欲望》对具有“性别气质”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具体阐述;杰奎琳·罗斯的《视觉中的性欲》则探讨了女性主义文论应该具有独立于男性文学的评价标准和体系;苏珊·弗里德曼的《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阐述了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的前途在于超越妇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

透过层出叠涌的女性主义文论,我们看到的是文论家们培植女性话语构建具有性别气质的文论的努力。这其中首推在20世纪70—80年代异军突起的美国著名女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她发表于80年代的文论《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走向女性主义诗学》和《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文化》奠定了女性主义文论寻找“自己的气质”的基础。她在这些作品中清晰地分析了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女性文学,考察了女性文学在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领域所表现出的独特创作和心理驱动力。她强调,研究女性文学文本的性别话语是女性文学在“后学狂欢”时

① [美]凯特·米勒《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65页。

② [英]弗里德曼《女权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

③ 瞿世镜《多丽丝·莱辛——不倦的求索者》,载《文艺报》2008年1月3日。

代“高歌猛进”的关键。通过致力于甄别被男性化的所遮蔽的女性话语结构,评论被曲解的女性形象,扭转被普遍化的女性偏见,从边缘角度阐释女性文学的价值密码,肖瓦尔特对女性文学理论进行了二元重构,并充分肯定这种有别于男性的性别特征在历史上的存在意义,为建构适用于女性的文论语境奠定了理论基础。^① 很多西方女学者继承了肖瓦尔特的女性主义文论二元结构模式,分析女性文学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重新打造被历史话语遮蔽的女性形象。英国女学者玛丽·雅各布斯的《浪漫主义写作与性别差异》认为,自古以来,女性写作就是在特定范围内的写作权力,一旦脱离了这个范畴就失去了女性特质的症候。苏珊·格巴及其《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巴巴拉·约翰逊的《差异的世界》、苏珊·格瑞芬的《妇女与自然》等都强调历史经验证明:强调性别差异是男女平等的基本事实,如果回避,则将使女性文论陷入“雄性化”的文本实践中,失去女性叙事的特质。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露丝·伊利加瑞(Luce Irigaray)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社会在力比多的象征投射中放逐了女性文本的特殊本质,只强调“一律平等”的文本实践,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其实暴露了所有文本中潜藏的“性歧视”。^② 因此,女性文本不仅要阐述女性形象的个性,而且要通过文本的研究,以一种不同于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视野发掘女性文学史,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全部传统男性中心文化的文艺观、评论观和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价。

经过学者的共同努力,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扭转了陷入“平权”误区的“女性权益”,基本使现代意义上的性别气质雏形初现。强调“性别”话语已经从边缘化的际遇、异质的“亚文化圈”走向文论界关注的重心,强调性别气质在女性文论中变得更有市场。首先,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英语系教授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提出了“社会身份新疆界说(new geographics identity)”^③,让“性别气质”研究有了

理论依据;其次,很多女性学者与女权主义分道扬镳,她们批判女权主义的过激主张。比如,卡米尔·帕利阿对“女性是性别牺牲品”的说法进行了严辞抨击,从波伏瓦到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加瑞、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都被她一一否定,她认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是一种智力待启蒙状态的性欲疯狂,是一种“很活泼,欣喜若狂”^④的幼稚行为。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女学者们从激进的泥潭中走出来,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健康成长认识更加清晰。萨德拉·摩根编著的《性别与人类学》、珍妮特·沃尔夫的《女性话语:关于女性与文化》、艾弗瑞尔·霍纳和苏·兹劳尼克共同撰写的《欲望的风景:现代妇女小说中的比喻》、萨拉·艾哈迈德的《差异:女权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等著作以从女性文学的母性特征、与周围人群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方面进行考察,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权益、角色分配特征等同男性进行比较,阐释了提倡性别文化构建意识,使社会不但能善待处于边缘境遇的女性,也让女性不再在争夺“话语霸权”中兜圈子。

三、超越西方视野

无论是“消费主义”的消长弥合还是“构建性别诗学”的稳步迈进,其视角都仅限于族裔内部的自我表述。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急速扩张,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家开始关注其他民族、种族和国家的女性问题。这股风气首先是由一部分来自少数族裔的西方女性主义者掀起的。美籍印度裔女性学教授桑德拉·默罕梯的《在西方的眼光

① Elaine Showalter, "Feminist Critical Revolution", in Elaine Showalter eds.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1985.

② Luce Irigaray,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4.

③ [美]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载马元曦等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83页。

④ Camille Paglia, "Ninnies, Pedants, Tyrants and Other Academic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vol. 5 (1991).

下》拉开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少数族裔及第三世界女性问题的序幕。

桑德拉的写作目的是“批评西方的人文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也批评了白人、西方的女性主义”^①。此文一是梳理并分析了20世纪以来女性学的发展状况,为女性学的跨国界跨文化运动寻求到了现实依据;二是打破了以欧美为中心的狭隘女性主义理论,提倡关注有色人种的女性权利问题;三是提出女性主义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中才能获得成长的空间。桑德拉不赞同女性主义的“全球化”指出全球化造成的危险,会使弱势族裔的女性话语屈从于强大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说,会导致自我文化更加弱势乃至消亡。^②同时,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族裔矛盾、种族仇恨、全球资本的大量集中对少数族裔的女性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也有国家权力中的宏观性别话语不平衡。女性除了在战争、家庭暴力和宗教所遭受的迫害,她们更承担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危害。^③但桑德拉认为,反对全球化与跨文化并不矛盾,跨文化是将日常生活、区域环境特征、民族意识形态、国别政治共性、多元文化个性和世界妇女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跨国界跨意识形态的妇女身份认同,反而有助于解决少数族裔的女性问题。她将建立跨文化的女性主义视野作为重要目标,但警告说,在这同时还要面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重挑战。^④美籍华人女学者周蕾的《社会性别与表现》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自诩为高雅女性文化的代表,以怜惜、俯视甚至歧视的口吻矮化非西方族裔的女性问题。^⑤周蕾将对社会性别和跨文化中的女性不平等认识用来阐释跨文化语境中被视为“差异”的第三世界女性身份的“自我表现”。性别的话语霸权让女性成了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西方的话语霸权又让非西方社会的女性成为“弱势中的弱者”,她们受到来自社会内部和西方世界的双重压力,最终极表现就是第三世界女性背负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乃至阶级歧视”^⑥。这些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

文论纷纷表达了提倡给予女性理论以跨文化策略的地位,用它来认识女性主义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白人女性文论家也逐渐参与到解构西方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文论思想,她们普遍要求拆解西方女性主义中心论的思想,以普世、多元、开放的思维促进女性主义文论的发展。这些思维既包含后殖民主义时代种族因素在内的融合、分野等诸多问题的新发展,又包含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的责任和权利重新分配。弗里德曼在《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一文中提出了对女性因为种族、国别因素而在自我身份认定方面的焦虑。^⑦本文前述她的“社会身份的新疆界说”,其实也反映了种族差异之下的女性身份确定及处于边界地带的身份摇摆不定的状况。在文中她提到了西印度裔美国人赞米·洛德的身份焦虑:赞米在论文《我的名字的新拼法:赞米》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黑人的女儿、知识女性、富裕黑人女性、女同性恋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赞米侥幸进入到了中产阶级行列,但是地位极不稳定,期间遇到了诸多排斥和障碍,不但有种族而且有性别上的烦恼。赞米的多重身份使她在不同地点、不同场合构成自我身份的摇摆和迷失,这种摇摆既包括在家庭中也包括在社会上的文化冲突问题。

在跨文化讨论女性主义之时,权力依然是女性主义文论恒久的话题,“权力”是在少数族裔女

① [美]默罕梯《再访〈在西方的眼光下〉:通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赢得女性主义的团结一致》,载《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Chandra T. Mohanty, *Feminism without Border: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 London, 2003, p. 236.

④ Chandra T.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周蕾《社会性别与表现》,载《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29页。

⑥ Linda Alcoff, “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 *Cultural Critique* 20, Winter (1991-1992).

⑦ [美]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载《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化译文集》,第82—105页。

性主义文论多次提到的话语策略。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汉娜·阿伦特就提出权力是基于集体意义上的社会特征。她在《人的境况》中表达了权力是集体的、是依靠数量集结而成的女性观念。^① 她的集体权力策略让来自不同地域的女性主义者克服了跨文化冲突的局限,为建立具有普世意义的女性主义策略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然而,阿伦特忽视了“权力”的阶级内涵和压迫的局限性,90 年代的女性主义文论对阿伦特这种集权主义的女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朱迪丝·巴特勒反驳阿伦特的依据就是“权力”涉及各种微妙的社会关系、存在模式、精神状态、民族和种族跨界等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综合来看,90 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者强调以文化和话语差异来认识女性的权力。她们在文章中试图探索搜集散落在世界、社会和家庭角落里的各种女性愿望,期待整理并与异质文化背景的女性文论达成共识,在跨文化语境下表达出某种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文论的主体意识。

结 语

女性主义文论的主体意识行动,在经济已经走向全球、电子信息技术渗入生活的角角落落的时代,借助商业资本和科技的力量将认知领域进一步扩大,已经从单纯的文本研究及对女性权益和政治利益的争取,扩展至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批判和注重女性个人欲望的满足。她们不但继续颠覆着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entrism)的女性文化运动,更加提倡女性的个人主义理想,推崇自由主义的资本和商业兴趣。同时,女学者也将哲学、美学、民族、文化、社会等差异纳入到了多元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和讨论中,并在此讨论中不断深化女性对社会和文化话语的认知能力,使女性主义文论在多学科领域的发展具有不断覆旧叠新的生命力。此时的女性主义文论更加成熟,她们的主体意识已经从“激进的表达”转向“和谐的共建”,她们期望建立与男性的主体性和谐相

处的主体间性,最终达到社会性别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目的。除此,值得关注的是,“后学”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文论希望通过文本话语的传播而干预由于种族、民族、国家、人口而导致的少数族裔及第三世界的女性困境,试图打破女性主义文论的国别、地区疆域,给尚处于困境中的第三世界女性问题提供巨大的思考空间。这是女性主义在多元理论空间和复杂世界格局中获得的意识能力和话语策略。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后学”思潮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多元化和争议性的时代产物,它的解构思维、心理分析以及运用哲学理论的独特创作实践和审美视角能否担当起未来女性主义文论的主体策略,尚需时间的检验。

(责任编辑:徐长恩)

^①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58.